



WANG ZENGRU ZHU
SHANGHAI SHUDIAN CHUBANSHE

王增如 著

无奈的涅槃

丁玲最后的日子

WUNAI DE NEIPAN
DING LING ZUIHOU DE RIZI



上海书店出版社



王增如 著

无奈的涅槃

丁玲最后的日子

上海书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奈的涅槃:丁玲最后的日子/王增如著.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3.1

ISBN 7-80622-987-6

I. 无... II. 王... III. 丁玲(1904~1986)—生平事迹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1589 号



无奈的涅槃——丁玲最后的日子

- 著 者 王增如
策划编辑 沈飞德
责任编辑 郑晓方
技术编辑 张绍军
装帧设计 范峤青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地 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ven.cc
印 刷 上海长阳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34 千字
印 张 5.75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一版 2003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7-80622-987-6/I·197
定 价 16.00 元
-

目 录



1

无奈的涅槃

——丁玲最后的日子

丁玲82岁的漫长一生走得十分艰难,可谓险象环生,伤痕斑斑,尝尽了人世间各种苦头。即便在她人生旅途的最后一段也不例外,复杂的抢救过程延长着她的生命,也延长着她对痛苦的感受,以致这位老人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话是一句沉重的叹息:死,是这样痛苦啊!



122

丁玲与“诬告信”事件

我确实也感觉到了,我感觉到来客的稀少,家中的冷清,我也从一些熟识的人那里听到一些反映。作协机关一位同我关系较好的司机,就曾善意地提醒我说:“赶快离开你们老太太吧,和她在一起,没你的好!”

在孤独、清冷和误解中,丁玲的病一天天加重。一直到死,她也没有甩掉像影子一样紧紧跟随她的那些个谣言。

138 丁玲与沈醉的书信交往

如今，两位由仇敌变为朋友的老人都已作古，他们的这一段交往，成为一个富有戏剧性的小插曲，沉入浩瀚的历史中。



146 丁玲与叶圣陶的交往

5月26日，她出现在叶圣陶家的四合院里，他们终于又见面了。上一次见面时，两个人还都是满头乌丝。85岁的叶圣陶，紧紧握住75岁的丁玲的手，许久都没有松开。

153 丁玲带我看望关露

窗口一缕阳光映照在关露的身上，她那刚刚洗过头的脸有些发亮、红润。她的脸庞瘦削，皮肤白皙，一双细眉下的单凤眼衬出秀气、灵气。



159 她心里始终是年轻的

老太太穿着这两件毛衣，确实遮去不少岁月的年轮，显得很潇洒，很有风度。现在我懂了，当她穿着这色彩鲜艳、式样别致的大毛衣去出席国宴时，去会见美国总统夫人时，去参加各种聚会时，去看她的亲朋好友时，她心里一定感觉很美，很年轻。

163 丁玲妙语答客问

1979年，湮灭了22年的丁玲奇迹般地重现于中国文坛时，已经是75岁了。国内外许多人关切地注视着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这样大的年岁，经受了那么多苦难，久居穷乡僻壤，又中辍写作20余年，她的脑筋还清楚吗？思路还敏捷吗？她还能写出新的传世之作吗？



166 丁玲年表

无奈的涅槃

——丁玲最后的日子

涅槃本是佛家术语,指全部修习的最高境界,也是寂灭、死亡的代名词。丁玲病重时曾说:“我肯定能成佛。”因而把涅槃一词借用于此。

为抢救丁玲的生命,中央领导同志、各有关部门和亲朋好友想了各种办法,尽了一切努力,而终于无法挽回。对他们而言,丁玲的逝世是无可奈何的。

病危时的一些抢救措施,逝世后的某些丧事安排,未必尽合丁玲本人的意愿。因而对逝者而言,这些也是无奈的选择。

是为题解。

丁玲82岁的漫长一生走得十分艰难,可谓险象环生,伤痕斑斑,尝尽了人世间各种苦头。即便在她人生旅途的最后一段也不例外,复杂的抢救过程延长着她的生命,也延长着她对痛苦的感受,以致这位老人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话是一句沉重的叹息:死,是这样痛苦啊!

但是她没有料到,后事的安排竟然也是这样的艰难。

生前,她是一些大矛盾的集中点。死后,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在后事安排上仍有体现。作为丁玲晚年的秘书,那些日子里我所经历的事情,比我在她身边工作的5年时间都更丰富更深刻,令我大开眼界,陷入深思。一部分是由于工作的需要,一部分是由于好心师长的善意提醒,当年我对发生的事情逐日留下了详尽的记录,其中有许多,当时我只是懵懵懂懂记下来,15年后再来翻检,细细体味,慢慢咀嚼,才得以深察其意,更多明白了内中丰富的蕴涵。由此也引发起我对当年情景的回想,对老太太的深深怀念。丁玲是一位杰出的人物,因此她的丧事安排能够惊动中组部中宣部,乃至中南海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即便如此,一些在平常人看来很简单的事情,在她身上却颇费周折。这是因为平常人的幼稚,还是因为政治的复杂?

丁玲去世已经15年了。作为15年前一些事件的当事人,我把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所历写在这里,依据笔记把当年发生的事情如实记录在这里,借以表达我对死者的悼念之情,或许也能给生者以遐想和某种启迪。

上篇:死,是这样痛苦啊!

一、丁玲:我可以死了!

回顾丁玲82年的人生,似乎有一半时间都在“辩诬”:为她的历史问题,为她的“反党集团问题”,为她的“右派”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艺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迎来思想解放的春天,过去被错批错划的作家们都陆续获得了新生,重新站在明媚的阳光下。丁玲的“反党集团”、“右派”帽子摘掉了,可是她的“历史问题”却长时间悬而未决。周扬说,丁玲自首叛变



丁玲1923年春天摄于常德。

那一年春节前,在上海、南京求学的丁玲因为经济拮据,回到家乡筹措钱款。1982年10月27日她在临澧县讲话时回忆说,我18岁回家乡来,是因为要去上海没有路费,我母亲要我回来要200吊钱。那时候,我们的祠堂每年都收好多谷子,规定凡到长沙念书的,每年补10石,我到上海念书,按说是要补20石。我是来向祠堂请求的。走了7个爷爷家,每个家里都很亲热,夸我有出息,把我当上宾款待,但提到要钱,却分文没有。

1923/05

的“疑点”可以排除,但“污点”仍然存在。他拒绝在中组部《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上签字。丁玲则为彻底辩诬而不屈不挠,向中央陈述自己的意见和理由。

1984年的仲夏,为丁玲历史问题彻底平反的工作终于露出曙光。

这一年的7月6日,正在北京协和医院住院的丁玲盼来了佳音。上午,陈明来到医院,一进门便递给丁玲一份文件,说:“昨天就收到了,怕你晚上睡不好觉,在电话里没告诉你。”陈明语气里透出一种喜悦,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

原来,这是中组部《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和一部分同志提出的修改意见。中组部的《通知》中说:

“一九五五年八月和一九五七年六月至九月,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先后两次召开扩大会议,对丁玲同志进行批判,定丁玲同志为‘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右派分子’,开除党籍。中央于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一九五八年一月先后批转了这两个会议的报告。‘文化大革命’中,丁玲同志遭诬陷迫害,并被关押五年之久。一九七五年五月,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又将丁玲同志定为叛徒,并报经中央批准。

“一九七九年,中国作家协会对丁玲同志被定为‘反党集团’、‘右派’、‘叛徒’的问题进行了复查,作出了改正结论,并于一九八〇年一月由中央组织部报经中央批准同意,恢复丁玲同志的党籍,恢复政治名誉和原工资级别。但有些问题解决得不够彻底。且没有在适当范围消除影响。为此,特作如下通知:

“一、一九五五年、一九五七年定丁玲同志为‘丁、陈反党集团’、‘右派分子’,都属于错划、错定,不能成立。对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中央批发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和一九五八年一月中

央转发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经过报告》，应予撤消。一切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消除影响。

“二、‘文化大革命’中把丁玲同志打成‘叛徒’，属于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平反。丁玲同志一九三三年五月在上海任‘左联’党团书记时，因其丈夫冯达叛变后把她出卖，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押解到南京；一九三六年四月鲁迅告诉冯雪峰，听史沫特莱说，丁玲曾想找党的关系。史沫特莱也向冯雪峰说了。九月冯雪峰通过张天翼，与丁玲取得联系，在冯的安



1927年12月，丁玲的处女作《梦珂》问世。1928年2月，《莎菲女士的日记》使她成名。从此丁玲步入文坛。这张照片流露出她踌躇满志、怡然自得的神态。

排下，她由南京逃到上海，然后派人送她到西安，转赴陕北。丁玲同志历史上这段被捕问题，从一九四〇年以来，党组织进行过多次审查，同她本人的交代基本相符。关于说她在南京拘禁期间，曾与叛变的爱人冯达继续同居和在一段时间内接受过国民党每月给的一百元生活费的问题，她一九三六年到陕北后即向组织上交代了。因此，一九四〇年，中央组织部进行了审查，并作出了‘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的结论。以后多年来的审查也未发现新的问题，因此‘仍应维持一九四〇年中央组织部的结论’。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风审干时，丁玲同志补



1933年5月，丁玲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绑架，拘禁于南京。1936年5月，她以看望老友李达、王会悟夫妇为借口，悄悄独自乘火车去北平寻找党的关系。这张照片是6月2日李达在北平为她拍摄的。

充交代了她一九三三年十月给敌人写过一申明书，其大意是‘因误会被捕，生活蒙受优待，未经什么审讯，以后出去后，愿家居读书养母’。丁玲同志这个‘申明书’只是为了应付敌人，表示对革命消沉态度，没有诬蔑党、泄露党的秘密和向敌自首的言词。

“三、丁玲同志在被捕期间，敌人曾对她进行威胁、利诱、欺骗，企图利用她的名望为其做事，但她拒绝给敌人做事、写文章和抛头露面，没有做危害党组织和同志安全的事。而且后来辗转京沪，想方设法终于找到党组织，并在组织的帮助下逃离南京，到达陕北。

“四、丁玲同志是我党的一位老同志，在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革命斗争中和文艺工作中，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对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一九五七年以后，她在二十多年的长时间里，虽身处逆境，但一直表现好。一九七九年恢复工作以后，她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1931年2月胡也频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后。3月，丁玲偕幼子返回湖南。她对母亲谎称胡也频要去苏联，自己一人无法带孩子，将不满周岁的祖林交由母亲抚养。图为她与怀抱祖林的母亲在常德合影。

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顾年高体弱,仍积极写作,维护毛泽东文艺思想,教育青年作家,几次出国活动,都有良好影响。‘事实说明,丁玲同志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现决定为丁玲同志彻底恢复名誉;因丁玲同志被错定、错划而受株连的亲友和同志亦应一律纠正,推倒一切不实之词,消除影响。”

丁玲坐在病房那张单人沙发里,戴上老花眼镜,一字一句看得很仔细,读毕,郑重地在上面对自己的意见。她坐直了身子,摘下眼镜,沉默良久,长出了一口气说:“这下我可以死了……”当时我对这句话十分不解,惊愕地看着她。

丁玲接着说:“40年沉冤,这次大白了。看来,人还是要讲老实话,几十年我都是这么说,如果以往运动搞逼供信,我乱说一气,不知要给中央这次审查工作造成多少麻烦!在北大荒农场的时候,红卫兵造反派非逼我承认是混入延安的,我被他们折磨得实在忍受不了,就说,‘是,是混入。’可是写材料的时候,我还按事实写,气得他们把纸全撕了。”

看得出,丁玲很兴奋,她滔滔不绝地讲起往事,讲起今后的写作计划,她还和陈明商量,要给中央,给胡耀邦总书记写信,表示感谢。

从这一天起,不知是丁玲感到年事已高,时光有限,还是因为已经有了“盖棺定论”的结论而放宽了心,她时不时地提起“死”的话题,说到她后事安排的设想。

那一年的深秋,丁玲筹办大型文学刊物《中国》。为了更充分地体现“五湖四海”的办刊宗旨,她提议聘请叶圣陶、冰心、周扬、胡风当顾问。大家一致赞成,并提出要请他们每人写几句话,发表在创刊号上。这件事只能由丁玲来办,她十分热心地张罗起来。叶圣陶很快应允,周扬却迟迟没有联系上。丁玲找到中国作家协会秘书长张僖,张僖告知周扬生病,正住在北京医院里。丁

玲对我说,你准备一个录音机,等周扬同志好一点了,咱们一起去北京医院看望他,顺便听听他对办《中国》的意见,回来把他的讲话整理出来,发在《中国》创刊号上。

我一直期待着这次丁玲和周扬的会见,却终未实现。后来张禧告知周扬患的是脑软化症,不宜说话。后来又有人说,周扬已经成了“植物人”,没有知觉,完全靠药物维持。

丁玲听到这个消息,沉默良久,然后说,我病危时,可别抢救我,我不想当“活死人”。她住进协和医院后,隔壁住着一位学者,已是多年的“植物人”,平时很少有人来看他,只有公家雇的“特护”每天帮他翻身、大小便。丁玲听说了他的境况,再一次说,我要成了这样,你们千万别让医生抢救我,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

1985年秋天,丁玲因糖尿病加重再次住院,医嘱不能劳累,不能写作。她只好坐在沙发上,与房间里那台小电视机为伴。一天下午,电视里播放北京人艺演出的话剧《遛早的人们》,描写的是老年人丧偶后再婚的故事。丁玲看完电视,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小王,看来‘养儿防老’这句话过时了。人老了,儿女大多数是靠不住的,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还是得靠老伴。你看,我要没有陈明照顾怎么办呀?陈明照顾我一辈子,他也快70岁了,等我死了,你们给他介绍一个50多岁的老伴,照顾照顾他。”这个话题,丁玲在垂危之际又嘱托过与她关系较近的作家李纳和张凤珠。

1986年1月,胡风的追悼会在死者故去7个月之后终于举行。但此时丁玲的健康情况已经不允许她去参加,她只能送一个花圈寄托哀思。她从报纸上电视里阅读收看追悼会的新闻之后,感慨地说:“我死后不要开追悼会。开那个会没有什么意思,许多想来的人来不了,不想来的人还得来!”

尽管丁玲对生死和“身后事”如此豁达,但实际上她既左右不了自己的治疗,更管不了自己的身后事。

二、“你们大家高兴吧,我肯定能成佛”

1985年10月8日,丁玲因糖尿病引发神经炎,左腿剧烈疼痛,再次住进协和医院311病室。专家为她会诊的结果是:糖尿病、肾功能衰竭、肺炎,医嘱按“病危”护理。这次入院后,尿素氮增高到80。作协领导唐达成、张光年,中宣部部长朱厚泽以及康克清、邓力群等,相继到医院看望。但她自己并不知情,即便知道了她也不会相信,她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很有信心。10月底,陈登科来医院看她,她大声笑着说:你放心吧,我死不了!11月她又对我说过:等我出了院,咱们要抓紧时间赶快工作了,还有很多事情呢。她感觉到时间的紧迫,但根本没有想到死,她认为死亡距离她很遥远。她乐观地盼望着出院。

协和医院有一流的医生,一流的医疗技术和设备,经过一段治疗,丁玲的病情得到缓解。元旦过后,她就想出院,想回家过春节,她多次跟陈明要求,跟医生要求,她跟我说:我活着,就得工作,整天住在医院里,什么也不能干,我受不了。但她毕竟是80多岁的老人,加之多年患糖尿病,体内脏器受到严重损伤,她的体质是很虚弱的。果然,1月中旬的一场感冒,让她的病情明显加重了。

2月1日早晨,丁玲注射了胰岛素,早饭只喝了一碗米汤。中午出现低糖,陈明喂她喝了点葡萄糖水。因连日咳嗽不能安眠,治疗呼吸道疾病的医生来会诊,为她拍了X光片,肺部有些阴影,但不严重。中医祝谌宇老大夫来,开了治疗咳嗽的药方。当天,作家协会的鲍昌来医院看望她,谈起《中国》的事情,丁玲很坚决地告诉他:《中国》我还是要办的。《中国》是丁玲和舒群主编

1985年12月15日，丁玲在协和医院里接受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农垦报》记者纪红采访。这是她生前最后一次接受采访。（杨松亭摄）



的大型文学双月刊,1985年1月创刊,一直面临着许多困难和矛盾,步履艰难。

2月5日是农历腊月二十七,丁玲因连日气管炎发作,咳嗽不已。早晨喝了一碗粥,吃了一个煮鸡蛋。上午9点多,出现虚汗现象,呼吸困难,她自己以为是低血糖引起的,但医生来检查之后,诊断为左心室急性心力衰竭,并迅速进行抢救,施行静脉穿刺插管输液。她的情绪很好,一边接受治疗,一边和护士开玩笑:“你们五六个人围着我一个人忙活,这像不像杀猪宰羊过大年呀!”中午12点左右,她的病情缓解,但医生告诉陈明:随时都有复犯的可能。陈明感觉到问题的严重,在此之前他并不知道丁玲心脏也出了问题,下午,他要我找出租车,把丁玲的儿子祖林、女儿祖慧、孙女小延和陈明的五妹接到医院。丁玲跟我说:“别吓着他们。”儿女们来到病床前,她平静地望着他们,只说了一句:“妈妈的病重了,最近几天出现了几次低糖,虚脱。”然后就转了话题,不谈自己的病情,爱抚地拉着孙女的手,问她期末考试考得怎么样,听说成绩很好,她欣慰地笑了。晚上,陈明怕出意外,整整在

病房守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8点半,我来到医院接班,催陈明回去休息。陈明望着昏睡中的丁玲,很不放心,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病房。

上午9点多,洪主任来查房,给丁玲测了血压、脉搏,血压是170/90。洪主任说,丁玲心力衰竭加重,当即写下病危通知。医生感觉到丁玲病情的严重,经过会诊,决定把她转到楼下的ICU加强治疗病房。医生告诉丁玲,那里病房条件差一些,几个病人同住一个大间,但检测仪器和治疗设备比较齐全,对治疗有利。丁玲点头表示同意。我赶紧打电话到木樨地,陈明刚到家,说马上就来。

11点多,丁玲连说“心脏憋得慌,什么时候转下去呀,快转下去吧,我难受死了!”我赶快去找医生。蔡大夫赶来,测量血压是180/100,紧急处置后,病情有所缓解,紧接着,六七个医生、护士举着输液瓶,推着活动床,把丁玲转到楼下。

ICU与丁玲原来住的311单人病房相比,条件确实相差很大。一间大病房,被玻璃框隔成七八个小间,每间里躺着一位重症病人。房间里到处是各种各样的医疗设备、仪器,有的发出滴滴答答的声响,令人不安。我看到丁玲满头大汗,护士们急着给她戴氧气面罩,连忙掏出手绢要给她擦汗。一位连鬓胡子医生严肃地对我说:“这里是无菌病房,请家属退出。”后来才知道,这位大夫是主管ICU的陈德昌主任。

陈明匆匆赶到,也被拦在病房外。下午,作协党组书记处的唐达成、鲍昌和杨子敏,以及王谷林、杨犁闻讯赶来,同样被ICU严格的制度挡在门外。陈主任只让陈明套上白大褂,进去看了5分钟。他出来告诉我们,丁玲病情有所缓解,神志清醒,自觉症状尚好,胸闷减轻,呼吸情况好转。为了让陈明放心,她不顾带着氧气面罩,还拉着床栏做了两个起坐动作,面带笑容,显得很轻松。